

高考40年，如何再出发

□ 郑若玲



所谓的“高考”或“统一高考”，包括统一考试与统一招生两方面。统一高考制度建立于1952年，1966年因“文革”被废止达11年，1977年恢复统一高考。统一高考恢复迄今40年，不断根据社会发展与教育需求进行革新，不仅对教育发挥了重要的导向功能，而且对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科学性是高考制度的根本所在

高考改革40年，在科学性上取得明显成就。这二者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而常常是水乳交融的。

科学性是高考制度的根本所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高考采用的是较为陈旧的考试办法，命题与施测主要靠经验与人工，缺乏测量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因而存在着诸多问题，如：考试内容重知识记忆轻能力考核，命题队伍建设缺乏科学性，评分手段落后，误差大，考务管理效率低下，难以适应考试规模扩大所带来的巨大工作量，等等。

为了提高高考的科学性，1985年，我国从美国引进了标准化考试。考试是一种测量，但凡测量必有误差，而误差大小可以进行人为控制，标准化考试就是一种按科学方法进行误差控制的测量，包括统一内容、统一指导语、统一时限、统一评分、确立常模、收集信度和效度资料等方面。标准化建设涉及试题编制、考试实施、阅卷评分、分数组合与解释各环节。以1993年为界，我国高考的标准化改革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制定考试大纲、编制试题与制定论述题评分细则、建设试题库、进行分卷考试和机器阅卷等；第二阶段主要是建立标准分数制度。尽管标准分数制度由于题库建设和观念惯性等原因经历反复，如今在高考统考计分上基本被弃用，但这一分数制度中“常模”所体现的科学性已广为认可，如今又以新的面目出现在新高考改革的计分方式中。正是在标准化考试改革的带动下，高考在编制试题、建设题库、提高施测技术含量、建立科学分数制度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效。

20世纪90年代后，高考命题立意开始关注能力，先是进行了单一学科能力测试的探索，此后，单一学科能力测试又变为社会发展日益强调的跨学科综合能力测试，旨在模糊学科边界，增强跨学科综合能力和学科间的知识相互渗透能力，引导学生全面掌握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着重培养综合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高考的科学性还体现在选拔标准的综合性上。长期以来，高考录取奉行的是“唯分是取”原则，“高考分数”几乎成为唯一依据。从人才选拔的信效度来看，单一评价手段既不科学也欠合理。近年来进行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选拔制度改革的积极探索，说明高考的科学性越来越受到重视。虽然在统一高考的常规录取中，统考分数仍是最重要的指标，但在自主招生以及当下浙江、上海试行的新高考方案

中，录取选拔标准的综合性已逐渐得到体现，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也正逐渐被纳入招生选拔体系中。

以统考为基础，进行多样化尝试

与此同时，高考改革的多样化特征也在逐渐显现。

中国是考试的故乡，具有悠久的统考历史与深厚的统考传统。此外，中国还是一个考试大国，就高考而言，每年有近千万的庞大的考生群体。统一高考在公平、效率与可比性方面，有着其他考试形式所无法比拟的优势，这也正是统一高考历经风雨仍得以长期实行的根本原因。然而，高考的“大一统”局面，越来越不适应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变化，高考改革的多样化特征正在逐渐显现。除了20世纪80年代的保送生制度，近年来我们还先后试行了春季高考、高校自主招生、高职单招、外语一年多考等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尝试。

高校自主招生是落实《高等教育法》中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的重要改革。2003年，教育部启动高校自主招生试验，按照报考条件、招生办法、录取结果“三公开”原则，在统一高考之前由各高校自行进行自主考核，但通过自主招生招生的学生不得超过当年招生总额的5%。自主招生自2003年试行至今已十余年，经过各方努力，已由最初几年备受质疑变为如今形成共识，说明自主招生是从“大一统”高考中“成功突围”且颇有成效的制度创新。自主招生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为试点高校选拔优秀生源，更在于有力推动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所倡导的高校招生多样化改革探索，有效践行了教育改革所力推的素质教育与德智体全面发展教育目标，也使高校办学自主权得到一定程度的落实。

高职单招是为了解决“一张考卷从北大清华考到高职高专”的统考弊端，更好地适应高等教育分层分类发展需要而进行的重要改革。长期以来，高职院校与普通本科院校采取统一考试、分批录取的招考制度，高职院校处于录取批次末端，加之“重学轻术”传统观念作祟，职业教育一直被视为“末流教育”，只是作为普通高校“查门无路人”后的“备胎”，高职院校招生也因此一直处于备受歧视、“门庭冷落”的艰难境地。如何突围生源困境成为高职院校生死攸关的核心问题。2007年，教育部选取若干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先行单独招考。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

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要求“加快推进高职院校分类考试”。2017年2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2017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再次强调“推进分类招考成为高职院校招生主渠道”。2017年，我国各省除西藏自治区外均实行了高职自主招生。

外语一年多考是针对长期以来高考“一考定终身”弊病而进行的尝试。为减轻学生的考试压力，教育部于2014年启动高考综合改革试点，外语科目实行社会化考试，提供多次考试机会。在北京、上海、广东、江苏等十几个省市公布的高考综合改革试点方案中，外语一年多考是多数省份改革的重点。不过，目前的外语一年多考仅限于听力、口语等内容，原则上学生从高一起就能参加听力考试，总计可考5次，笔试仍是一年一次。

为高考“减负”，使改革轻装上阵

尽管40年高考改革在科学性上取得明显成就，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由于高考背负了太多的社会责任，加之历史传统与社会观念的影响，改革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具体来说，高考制度应在以下两方面加大改革力度，予以重点突破。

减轻高考社会责任，回归高考教育功能。在我国，高考背负了太多的社会责任，有些责任甚至不该由它来承担。近年来出现的许多教育公平问题，表面上看是高考所致，背后其实是教育体制本身乃至社会体制的问题。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区域不公、高考移民、异地高考、高考减招事件等，根源都在于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不均，教育资源分配机制不合理。

事实上，高考本身具有许多正面功能，如“以考促学”有利于提升社会文化水平，科学命题可以解决学生知识结构残缺不合理问题，考试内容可以体现国家意识、实施政治教化，公平公正的考试制度可以凝聚民心、稳定社会，科学合理的选才制度可以为高校甄别合格新生、保障高等教育质量等。我们要做的，是卸下捆绑在高考身上的众多教育与社会包袱。高考改革应该以恢复和强化教育功能为根本原则，并兼顾社会功能，提升招考的科学性，以科学推进公平，使高考不能轻装上阵，锐意进取。唯有如此，考试招生才能出色发挥选拔英才、服务教育的本质功效。

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践行高校招生自主权。

2003年，教育部谨慎推出高校自主招生改

革试点。虽然在十余年的探索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但教育主管部门和招生高校在考核方式、报考条件、录取标准、公示范围、政策倾斜、考试时间等方面不断探索与调整，高校自主招生的能力与水平不断提高。笔者认为，目前自主招生的改革力度还不够大，今后应强化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意识，在以下方面大力践行高校自主招生权。

一是对于高水平大学，在充分尊重其改革意愿的情况下，可以鼓励它们将高考分数由录取的“硬条件”调整为“软标准”，像欧美发达国家的一流大学那样，根据高考成绩、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高考成绩和综合素质评价、高校自主笔试或面试表现、考生获奖材料或才艺证明、参加的社会活动及表现等各方面情况进行多元评价与综合录取。与此同时，增强招生机制的透明度，让自主招生“沐浴”在阳光下、成长在自由中，如此，方能发挥其科学选才与引导教育的最大功效。

二是强化高校招生多样化意识，为“奇才怪才”等特殊人才开辟绿色通道。高等教育与普通教育有很大的不同。普通教育主要是给学生打基础，为国家培养合格公民，同时也为进一步深造做好准备。但高等教育旨在培养专业化人才，即各行各业所需要的“专门人才”，所以高等教育对象既需要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全才”，也需要在某方面有突出专长的“奇才怪才”，后者甚至更有可能成为某行业的“专家”。因此，高校在招收新生时，应本着多样化原则，广泛招收多样化学生，以培养多样化专门人才。

目前有资格进行自主招生的高校，基本上都是名列前茅的高水平大学，它们所缺乏的不是总体成绩优秀的学生，而是某方面或某领域的“偏才”“怪才”或其他各种特殊人才。事实上，自主招生改革的原本动机就是在传统的“唯分是取”制度外另辟蹊径，采用多元的标准、多维的视角，将那些各有所长的“奇才”、“怪才”乃至“偏才”纳入选择视野。但出于公平的压力，目前高校自主招生主要还是倚重可量化的单一标准来评价学生，招收到的几乎都是“全才”，这显然偏离了自主招生的改革目标。目前大学对生源多样化的意义普遍认识不够，对特殊人才的价值也普遍缺乏自觉意识，今后应开阔眼界，拓展思维，加强研究，为特殊人才进入高水平大学开辟科学、合理、可行的绿色通道。

高考制度在60多年的历程中饱经风雨，尤其在过去的40年，高考见证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巨变，并努力与时俱进尝试了许多颇有意义的改革。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和竞争起点上移，高考制度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还会继续改革，而且涉入“深水区”后，改革难度将进一步加大。但无论高考如何变化，一些基本的理念与原则都必须一以贯之地体现与遵循，比如坚守公平公正、秉持科学创新、促进个性发展、强化育人功能、提升教育质量、服务社会需求等。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加强高考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清晰教育问题与社会问题的边界，尊重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凸显高考制度的教育功能。高考改革，永远在路上。

(作者系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念活一部人才经

□ 孟令浩

早在正定工作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就大力倡树新时期的用才观，真诚关心人才、爱护人才、成就人才，念活了一部“人才经”。认真学习感悟习近平总书记在这一时期的人才思想和实践，对我们进一步做好人才工作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正定县工作期间，通过对历朝历代的治国理政实践、欧美强国的崛起历程及正定的现实状况的分析，形成了强烈的人才意识，高度重视人才工作。《知之深 爱之切》一书收录了习近平总书记1982年3月至1985年5月在正定工作期间的讲话、文章、书信，透过其书可以看出，在正定工作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就大力倡树新时期的用才观，真诚关心人才、爱护人才、成就人才，念活了一部“人才经”。认真学习感悟习近平总书记在这一时期的人才思想和实践，对我们进一步做好人才工作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求贤若渴，广纳英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贤才者，国之大宝也，县亦然。”“对人才问题早认识、早重视、早去抓，我们的经济工作就早主动、早搞活、早见效。”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在对人才的问题上，要有“五百金买马骨”的态度和精神，要有求贤若渴、爱才如命的精神。1983年，他亲自撰写面向全国“的招贤榜”，研究制定《树立新时期用人观点，广招贤才的九条措施》，成立由县长任总经理的“人才技术开发公司”，组成专门班子进行人才招揽工作，当年就引进各类人才46人，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招来科技人才257人；向全国专家、学者发出100多封联系信，还亲自函邀，聘请他们组建正定顾问团。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经济学家于光远等53名各领域专家欣然应邀。在百业待兴的上世纪80年代初，习近平就以强烈的紧迫感招贤纳士，充分体现了其远见卓识、政治智慧和领导才能。他对人才的珍视，为广大党员干部作出了示范。处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必须树立强烈的人才意识，广纳四方英才。

唯才是举，以诚相待。新闻媒体曾报道过一个习近平“扯开嗓门喊人才”的故事。为了引进研制出“三露”（粉刺露、亮肤露、增白露）等医用化妆品的武宝信，1983年初，习近平在忙完一天工作后，带着县长、副县长来到武宝信所住的小区，挨家挨户地找，直到晚上十点多仍未找到。他竟扯开嗓门在小区楼下大声喊了起来：“武宝信！武宝信！……”武宝信在家里听到后赶紧跑了出来，将他们迎了进去，一直谈到天色将白，将自己的项目带到正定，一年就为正定赢来30多万元利润。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他亲赴无锡，邀请懂经营、善管理的能人邱斌昌担任油嘴油泵厂厂长；为调入机械工程师刘玉仲，正定县上下南皮、十次求贤，终于办成了调动手续。“人心换人心，黄土变成金”。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类优秀人才面临的选择更多，人才流动进入“用脚投票”的时代，更需要我们用真心真情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量才使用，人尽其才。习近平对于确有真才实学的同志，大胆信任、放手使用，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对招来人员，始终掌握“不当神供当才用”原则，根据每个人的技术专长对口安排，在人员、设施、物资、款项方面给他们提供方便，为他们发挥作用创造条件。工程师郝月谱到正定后，被任命为乡镇企业局副局长兼化学工业总公司经理，不到半年，该公司就上了11个化工项目。对本地人才，大胆选拔，做到“才”者大用。土生土长的作家贾大山，在习近平的推荐下，被任命为文化局局长，打破了党外人士不任正职的“规矩”。他上任后以身行令，以治理乱，很快打开了文化工作新局面。岸下村农民黄春生经过十几年刻苦钻研，培育出“冀棉2号”优种，县里破格录用他为国家干部，并评定为助理农艺师，安排到农科站工作。县里先后给543名科技干部评定了技术职称，31人调整了对口专业，基本做到了人得其所、才尽其用。俗话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使用人才，就应当用在其位，用当其时，充分调动人才积极性，使各方面人才各得其所、各尽其长。

鼓励创新，宽容失败。习近平在《树立新时期用人观点，广招贤才的九条措施》中指出：“愿为全国各地技术人员提供试制新产品，推广新技术所需要的工作、生活条件。同时也允许研究项目失败，不追究责任，工资报酬、往返车费等照付。”“对科研人员和自学成才者正在业余研究的有前途的科研项目，若愿意给予本公司（正定县人才技术开发公司），而又被本县所录用者，将尽力协助解决费用困难。”“在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上，习近平要求各个公社、大队和县直单位对于那些能够带来新项目、新品种的人才，只要这些项目、品种本地确有条件、确有潜力上，就要想方设法把人才请来，把项目搞上去。同时，提倡多搞一些短期聘用，或新技术、新项目的转让。这些政策措施体现了鼓励创新、尊重创造、宽容失败的鲜明导向，激发了广大人才的创业热情。当前，创新驱动战略正在深入实施，新旧动能正在加速转换，都离不开人才引领作用的发挥。我们应坚持向用人主体放权、为人才松绑，不断完善扶持政策，抓好平台载体建设，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促进各类人才创新创业迸发活力。”

真情关心，热情服务。习近平认为，对于有突出贡献的人才，给予较高待遇和报酬，是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对这些人，规定了利润分配比例分成、给予重奖、晋级晋职等条款，制定了配备助手、车辆、搬煤到屋、送粮到户等具体措施，解决生活上的后顾之忧，并针对人才的个人实际情况提供个性化服务。例如，习近平曾帮助到正定筹建淀粉厂的68岁的技术员李兵辰妥善安排了生活，还给他介绍了老伴，组建了家庭。李兵辰忘我工作，使淀粉厂很快竣工投产，年生产淀粉1.8万吨，产值150万元，纯利润20万元。近些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我们有条件为人才提供更加优厚的待遇，也有能力服务好人才多元化需求。用好、留住人才，必须全面掌握人才需求，既要任事业发展上激励扶持，又要在日常生活上悉心照顾，让人才得到合理回报，舒心安心创业生活。



让更多产粮大省成为余粮大省

□ 辛翔飞 王济民

和黑龙江是我国粮食生产的高风险区域，安徽、河南、河北和山东是粮食生产的较高自然风险区域。如2009年内蒙古、辽宁、吉林共同遭受受到较为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分别比上年减产7.02%、14.08%和11.38%。如果粮食净调出高度依赖少数几个省份，一旦这些省份同时或大部分发生大的自然灾害，就会对国家粮食安全带来严重威胁。

不利于粮食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保护。我国粮食生产中普遍存在着农药、化肥过量使用的问题，且已对土壤和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如果这些产粮大省长期保持高强度的粮食生产压力，势必使土壤和环境污染状况更加恶化，其累积效应将影响到粮食生产的可持续发展。特别是产粮大省中的内蒙古、黑龙江、吉林水资源尤为紧缺，更难满足足长期高强度发展粮食生产的需要，久而久之，势必造成地下水严重超采，生态遭受严重破坏。

不利于区域协调发展。5个产粮大省除内蒙古外，近年来的年均财政收入明显偏低。如果今后仍然长期将解决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粮食短缺的重担全部压在少数几个产粮大省身上，势必继续恶化其财政状况，进一步加大产粮大省与其他省份的经济发展差距，进而影响其民生改善和社会事业与全国的协调发展。

不利于主产区非粮食调出省份粮食生产的稳定。如果粮食净调出向主产区少数省份过度集中的趋势不加遏止，一些主产区省份也会加快向产不足需演进。在13个主产区中，山东、江西、四川、江苏、湖南、河北等部分省份，近年来已出现了粮食净调出量明显下滑的趋势。如果上述粮食主产区省份粮食净调出率持续下滑的趋势不加改变，一方面，可能会有更多的主产区省份由净调出变为净调入；另一方面，影响主产区粮食发展的深层次矛盾难以得到有效解决。随着新形势、新情况的变化，目

前产粮大省亦可能逐渐失去发展粮食生产的内在动力。这两方面的不利情况一旦形成叠加，将对我国粮食安全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在粮食生产上不能只谋一时，必须十分珍惜当前国际粮食环境宽松、国内粮食供应充裕的机遇，在机制建设和化解深层次矛盾上下工夫，充分发挥主产区各省份在粮食贡献方面的共同作用，提高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的粮食自给率，为主产区特别是目前净调出量大的几个省份减轻粮食生产压力和进行相应的休养生息提供支持，形成以主产区集体贡献为中坚、以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共同支撑为基础的全国一体化粮食安全保障格局。具体说来，需做好以下几点：

在粮食主产区实施“休耕轮作计划”。抓住当前国际粮食市场环境宽松、国内粮食市场供应充裕的宝贵时机，由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较大力度地在粮食主产区实施“休耕轮作计划”，并把重点放在粮食净调出大省。这样，既有利于缓解粮食净调出大省资源环境压力，让部分水土资源得以休养生息，也有利于化解当前粮食高库存的压力。

提高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的自给率。根据国家粮食消费需求情况和主产区水土资源对粮食生产的承载能力，明确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应达到的粮食自给率，并采取有效的约束和激励措施使其得以实现。这既可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建设更具宽厚的基础，也可为主产区，特别是产粮大省休耕轮作和修复生态环境提供有力支持，还有利于粮食主产区在减轻粮食供给压力的情况下，投入相应的土地和财力资源发展二三产业，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如果从财力上讲，主产区在粮食生产投入上往往是“有心无力”的话，那么，主销区则是“有心”“有力”，粮食主销区更有条件增加粮食生产基础条件投入。因此，主销区更应胸怀大局，着力提高粮食自给率，为国家粮食安全承担起应有的责任。

进一步完善粮食扶持政策。实行“补贴标准相同、补贴主体有别”的政策，国家集中财力支持主产区。“补贴标准相同”，即国家依据粮食生产成本变化和农民增收需要，出台对种粮农民的生产性补贴和收入性补贴的基本标准。对种粮农户和粮食生产新型经营主体而言，无论主产区、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在执行上都只能高于国家基本标准，而不能低于这一标准，以保持全国所有种粮农民和新型经营主体能够获得基本公平的待遇。“补贴主体有别”，即把现有国家对主销区种粮农民和新型经营主体承担的生产性补贴和收入性补贴，绝大部分或全部改由主销区政府承担，中央财政把这一部分财力用于扶持主产区特别是粮食净调出大省发展粮食生产。同时，对执行国家基本补贴标准有困难的主销区，中央财政亦应给予相应的扶持。这样，既有利于国家集中财力保重点，又有利于全国粮食生产的共同发展。

完善对各级政府绩效考核机制。粮食生产的兴衰和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成败关键在于各级政府重视并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因此，应把“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这一要求体现在对各级政府的工作考核之中，分类提出粮食产能建设任务，将完成这一任务的情况作为工作考核的硬性条件。主产区发展粮食生产的任务极其艰巨，在考核指标体系设计上应将粮食生产的权重与其工作付出相一致。非主产区特别是主销区，虽然粮食生产在其全部工作中所占比重较大，但从粮食安全全国一盘棋以及主产区与非主产区粮食生产压力此消彼长的角度考虑，不应因其粮食产量占比小而视其在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中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少，亦应把粮食生产任务的完成情况作为硬性指标进行考核。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